

才溪乡调查：穿透纸背的调研作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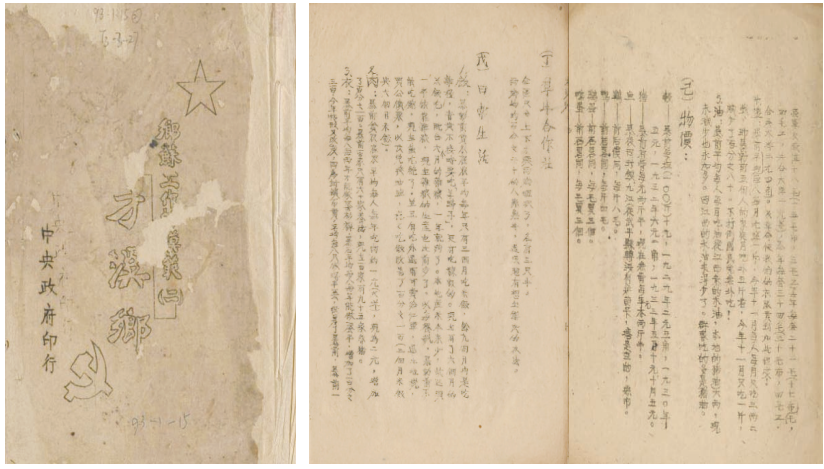
□ 陈熙满

在福建省档案馆卷帙浩繁的红色档案中，一卷关于才溪乡调查的泛黄档案——《乡苏工作的模范（二）——才溪乡》（系1934年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给参加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代表的16开油印本），依然熠熠生辉。它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在党的历史长河中闪烁着独特的光芒。

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革命正处于艰难曲折的蛰伏与奋进交织阶段，革命根据地的建设与发展面临诸多严峻挑战。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全国建立了10多块农村革命根据地，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但对于农村革命根据地到底应该怎样建，党和苏维埃政府进行了初步探索，涌现出了长冈乡、才溪乡等苏区建设的模范。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形势异常严峻：外有国民党军队对苏区发动的大规模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企图从军事和经济两个方面扼杀中央苏区，导致苏区物资极度匮乏、物价飞涨，群众生活和红军给养遭遇严重困难；内有党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蔓延，部分同志把军事斗争与经济建设对立起来，错误认为在革命战争环境中没有进行经济建设的可能，要等战争最后胜利了，有了和平安静的环境，才能进行经济建设。为打破敌人封锁、巩固苏区政权，批驳和纠正“左”倾错误论调，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再一次来到被誉为“中央苏区模范乡”的上杭县才溪乡，开展了一场极具深远意义的调查研究。这也是毛泽东第三次到才溪乡调查（前两次是在1930年6月和1932年6月，分别了解闽西地区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情况，以及解决如何把经济建设推向新高潮的问题），经过为期十多天深入细致的社会调查，写下了《乡苏工作的模范（二）——才溪乡》（后改名为《才溪乡调查》，系《才溪乡调查》的最早版本）这篇光辉著作。

毛泽东此次才溪乡之行，既没有前呼后拥的排场，也没有层层陪同的



《乡苏工作的模范（二）——才溪乡》（福建省档案馆 藏）

《乡苏工作的模范（二）——才溪乡》“（六）经济生活”中的“（戊）日常生活”与“（巳）物价”部分内容（福建省档案馆 藏）

阵仗，堪称“极简”。他身着粗布衣、脚穿草鞋，自带干粮，从江西瑞金出发，沿江而下，拒绝当地干部安排的交通工具，坚持不搞特殊化，步行翻山越岭。为了掌握第一手真实素材，他不辞辛劳，刚才到溪乡便一头扎进田间地头 and 农家院落，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零距离体验乡村生活，真实记录基层实际状况。一次上门调查中，毛泽东看到群众在劈柴，便主动走上前去帮忙，边劈柴边聊天：“一担柴能卖多少钱？可以换多少米、盐、布？砍完柴后栽不栽回去？”其间，他还以发展的眼光劝告群众，砍柴要有计划，边砍边栽，尽可能节约烧柴。这种深入群众日常生活进行调研的做法，充分体现了毛泽东简朴务实的工作理念。

为全面了解才溪乡情况，毛泽东甘当小学生，虚心向群众学习，坚持从民众的创造性实践中寻找答案。他先后召开区、乡工作人员座谈会、工人代表会、贫农代表会、耕田队长会等各种类型的座谈会。每次座谈会他都是亲力亲为，热情地招呼大家围坐，亲自沏茶递水，营造轻松氛围，鼓励大家讲真话、道实情、与大家平等交流。对于座谈的主题，他更是充分准备，事先拟定详细的调查提纲，

内容涵盖才溪乡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生活等方方面面的情况，可谓是事无巨细、周密详尽。在座谈中，他总是想方设法使自己提出的问题让人一听就懂、简单易答。对于某些确实难以描述的复杂情况，也总是先耐心解释一番，再细加询问，直到把事情的前来龙去脉理清摸透为止。

翻开《乡苏工作的模范（二）——才溪乡》，文稿共分7个部分：行政区划、代表会议、此次选举、乡苏下的委员会、扩大红军、经济生活、文化教育，文中有大量精确到个位数的统计数据，如全乡人口数、代表选举比例、参加红军人数、劳动力问题，以及合作社、物价、公债等。这些数据并非毛泽东粗略估计而来，而是他通过多次召开调查会，走村串户，经过反复摸底调查统计得来的。他注重用数据说话，坚持以一丝不苟的态度对待每一个问题、每一组数据，力求真实精确。尤其是文稿中关于“（戊）日常生活”的米、肉、衣、盐、油与“（巳）物价”的谷、猪、鱼、鸡等的具体记录，更是生动展现了其深入群众、注重数据实证的调研作风。

毛泽东始终把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关注群众生产生活环境，积极为群众解决实际困难。《乡苏工作的模范

（二）——才溪乡》文稿中，“群众”二字出现频率极高，达37次之多，而且诸如“群众利益”“群众生活”“发动群众”“动员群众”“使群众欢喜”“通知群众”“帮助群众”“群众互助”“群众决定”“群众需要”等表述，更是层见叠出，折射出他以民为本的执政理念。文稿中的一个细节尤其值得深思：“（庚）经济公债”之后第六部分的结尾处，毛泽东特意总结强调，“我们重复地说，只有经济建设配合了政治动员，才能造成扩大红军的更高的热潮，推动广大群众上前线去”。也正是由于党和苏维埃政府真正为人民群众谋利益，所以才能够赢得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并转化为战胜强大敌人和各种困难挑战的力量。

1934年1月，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毛泽东对才溪乡等地方苏维埃的政权建设经验作了详细总结，并称才溪乡为“全苏区第一个光荣的模范”和“争取全中国胜利的坚强的前进阵地”。在会上，毛泽东将《乡苏工作的模范（二）——才溪乡》连同《长冈乡调查》印成小册子分发给每个代表，并在大会上号召全苏区向才溪乡和长冈乡学习，搞好根据地建设，发展革命战争，夺取全国胜利。

才溪乡调查是毛泽东开展的重要调研实践，堪称我党调查研究工作的典范之作。这一调研不仅为当时中央苏区的建设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导，其蕴含的深入群众、求真务实的工作方法，与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中“改进调查研究”“密切联系群众”等要求高度契合。调研所体现的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思想内核，以及“轻车简从”“问计于民”“掌握实情”等具体方法，为党员干部树立了践行群众路线的标杆，至今仍对加强新时代党的作风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实践价值。

（作者系福建省档案局局长、省档案馆馆长）



抗战时期《新疆日报》对《论持久战》的传播

□ 代亚平

《论持久战》发表后不久，远在西北边陲的《新疆日报》充分发挥舆论引导的优势，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对《论持久战》进行了持续而深入的传播。在当时众多报刊中，《新疆日报》无论在传播的广度还是深度上都独树一帜，推动中国共产党持久战战略逐步进入新疆各族民众的视野，并最终赢得各族人民的广泛认同与坚定支持，进一步提升了中国共产党在新疆的政治影响力和威望。

连载《论持久战》全文。1938年7月1日《论持久战》在《解放》周刊发表后，由于王明从中作梗，《论持久战》未能在长江局主管的《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上刊载。但地处抗战后方的《新疆日报》不仅刊发了介绍《论持久战》的社论，还对《论持久战》的全文进行了连载。《新疆日报》也是继《每日译报》之后，全文连载该著作的报刊。1938年11月10日，《新疆日报》在头版刊发社论《介绍〈论持久战〉》，同时在第2版整版刊载了《论持久战》的目录和第一部分“问题的提起”，自此《新疆日报》对《论持久战》的连载持续至11月25日。《论持久战》能够在《新疆日报》进行公开刊载，一方面是由于“亲苏、联共”政策的施行，新疆允许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另一方面，这一时期《新疆日报》实际由中共党员主持，在宣传过程中着重凸显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及抗战主张。及时连载宣传《论持久战》不仅有助于抗战后方的新疆各族民众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抗战主张和持久战战略，也是对中共中央明确要求“各政治机关在宣传鼓动工作中要加重说明中日战争之持久性，中国抗战是艰苦的持久战”的主动响应。

刊发阐释《论持久战》的社论。

《新疆日报》还相继刊发《坚决给敌人以新的更大打击是争取相持阶段到来的关键》《论目前抗战洪流中的两大逆流》等社论。这些文章除宣介《论持久战》的主要内容和重要意义之外，且以《论持久战》的核心观点为理论框架，剖析国际国内战争发展形势，批判“亡国论”与“速胜论”等错误思想，并阐释持久战的战略必要性与其正确性，明确指出坚持持久战是夺取抗战胜利的唯一可行路径。1941年10月15日，刊发社论《伟大的人民力量》，明确指出，“民众的力量是伟大的，他是抗战的‘力的源泉’。民众力量的动员与组织，乃是坚持持久战和争取最后胜利的基本条件之一”。这一论述与《论持久战》中“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的核心命题形成呼应，深刻揭示了抗日战争胜利的根本逻辑。《新疆日报》的社论主要由中共党员撰写，这些文章不仅从多维视角深化了对《论持久战》战略思想的阐释，更结合战争发展形势进行具体分析，有助于民众了解抗战局势，加深对持久战战略的理解与认同。

转载其他报刊解读《论持久战》的文章。为加强《论持久战》的宣传阐释，《新疆日报》还转载了其他报刊解读《论持久战》的文章。1939年1月8日和10日，《新疆日报》刊载了由吴明译自苏联《真理报》的文章《持久战的口号在中国有何意义》，这篇文章是1938年9月5日时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的任弼时发表在苏联《真理报》的文章。该文从中日战争不是速决战而是持久战，主要战术为运动战、游击战、阵地战三者的配合，战争将经历防御相持反攻三个阶段，巩固和加强中国各民族力量的团结是

抗战胜利的关键因素等方面进行了阐述，强调持久战是中国武装抗日唯一正确的战略，这些观点与《论持久战》中的核心思想高度契合。1939年8月25日至27日，《新疆日报》转载了方直1939年7月1日发表在《全民抗战》上的《论持久战与“拖下去”》，针对一些人错误地将“持久战”理解为毫无期限的“拖下去”，文章以《论持久战》中关于“持久战”的观点对这两者的区别展开了论述，有利于消解认知困惑，帮助读者廓清思想上的迷雾，也进一步扩大了持久战思想的传播和影响。

注重《论持久战》传播的大众化。尽管《论持久战》在文本表述上已力求通俗，但作为一部军事理论著作，对于文化水平较低的民众来说，理解和把握其思想仍有一定困难。因此，《新疆日报》采取了灵活多样的宣传策略，实现了《论持久战》传播的大众化。一是开设“抗战常识问答”栏目，以“一问一答”的形式摘录介绍了《论持久战》的主要内容，包括中日双方存在着的互相矛盾的四个基本特点、持久战的三个阶段、游击队与正规军、游击战战术以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内容。二是通过“读者信箱”栏目，及时回应读者提出的关于持久战战略的问题。如1940年2月23日编辑部答复了读者荣夫关于“抗战总战略”的提问，首先指出“我们抗战的总战略是持久战”，并重点介绍了《论持久战》关于抗战三阶段中的“防御阶段”和“相持阶段”的内容。三是运用漫画、歌谣等艺术形式，宣传持久战思想。1939年7月7日出版的“七七”二周年纪念特刊，登载了飞远和哈力克创作的连环漫画《抗战三个阶段敌我力量的对比》，以视觉图像的形式生动展示了持久战战

略防御、相持和反攻三个阶段的进程。这些传播形式有效突破了理论文本的阅读障碍，实现了持久战思想传播的大众化和普及化，使更多民众了解持久战战略，从而坚定持久抗战和抗战必胜的信心。

实现《论持久战》多语种传播。1938年，中共党员进入新疆日报社社，逐步构建起以迪化（今乌鲁木齐）总社为中心，以伊犁、塔城、阿山（今阿勒泰）、阿克苏、喀什、和阗（今和田）六分社为分支的宣传网，为《论持久战》在全疆的多语种传播奠定了基础。在中共党员的努力下，《论持久战》除在总社主办的《新疆日报》汉文版进行大力宣传外，其他分社也通过刊载翻译版《论持久战》进行传播。1938年秋，哈萨克族知识分子穆华希·贾肯将中共党员李云扬赠送给他的汉文版《论持久战》带回阿勒泰，并翻译成哈萨克文先后在《新疆日报（阿勒泰版）》和《新阿勒泰》杂志发表。《新疆日报（阿勒泰版）》刊登的哈萨克文版《论持久战》是國內最早翻译成少数民族语言进行传播的版本。1939年5月《新疆日报（和闐版）》出刊，《论持久战》以专题的形式在《新疆日报（和闐版）》的副刊作了介绍，推动《论持久战》在和田地区的传播。《新疆日报》对《论持久战》多语种的传播，这一举措在全国报刊宣传中也具有开创性意义，拓宽了持久战思想传播的地域范围和受众群体。



罗阳：用生命践行航空报国

□ 钟宪章 肖瑶

罗阳（1961—2012年），辽宁沈阳人，我国航空航天领域的“逐梦人”，曾任歼-15舰载机工程总指挥、沈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沈飞）董事长。2012年11月25日，罗阳在随“辽宁号”航母成功完成舰载机首次起降试验任务返港靠岸后，因连续高强度工作诱发心脏疾病，倒在了他毕生热爱的航空事业征程上，年仅51岁。2018年，党中央、国务院授予罗阳改革先锋称号，肯定其在推动我国航空工业发展进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他将个人理想深深熔铸于国家航空事业的壮阔蓝图，实现了从技术空白到世界前列的跨越，为我国航空工业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临危受命，开启舰载机研发征程。2004年，伴随着中国航母工程的战略布局，歼-15项目正式启动。面对西方国家技术封锁与国内舰载机研发经验空白的双重困境，罗阳临危受命担任项目总指挥。在从零起步的艰难局面下，罗阳果断创新设计制造手段与组织模式，为项目推进开拓新局。设计阶段，罗阳打破传统研发流程，协调沈飞选派数百名工艺、制造骨干进驻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这些工程师带着制造环节的实际需求，与设计人员深度协作，在气动布局、结构强度等关键设计环节，将可制造性、装配工艺等因素前置考量，提出优化建议，使设计方案在满足性能指标的同时，大幅降低加工难度，避免了后期因设计与制造脱节导致的返工。制造阶段开启后，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的设计团队反向进驻沈飞，组建由设计人员、工艺专家、一线工人构成的联合攻坚小组。这种“厂所融合、设计制造一体化”的创新模式，实现了信息的实时交互与问题的高效解决。凭借先进的组织模式与研发体系，罗阳与团队仅用8年时间，便完成了歼-15从立项到首飞的全过程，填补了中国在舰载机领域的空白，创造了世界舰载机研发的“中国速度”。

罗阳常说，“研制战机，要么是零分，要么是一百分，没有中间分”！在舰载机起落试验中，为了获取与飞机保障相关的精准数据，他强忍飞机起降产生的巨大轰鸣声对心脏造成的压力与痛苦，每次都坚持站在舰岛上，全神贯注地观察每架飞机触舰瞬间的飞行状态，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在产品研制中，他也秉持“零分或一百分”的严苛标准，针对技术难题，组织团队开展技术攻关与创新实践，构建起高效的飞机研发体系，为歼-15等舰载机的研发列装奠定基础。

2012年11月23日，在交付海军两个月后，我国自主研发的歼-15舰载战斗机在辽宁舰上成功完成首次阻拦着舰和滑跃起飞试验。通过歼-15项目，我国在高强度航空材料、先进制造工艺、航空电子等关键领域取得了多项技术专利，显著提升了我国航空工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歼-15舰载战斗机的成功列装，不仅标志着中国海军正式踏入航母时代，更带动了我国航空工业的整体发展。

攻坚克难，实现舰载机技术突破。在歼-15研发征程中，气动布局设计是决定其性能优劣的核心环节。良好的气动布局有助于飞机在着舰过程中保持稳定的姿态，确保机身结构能够承受瞬间的气动载荷和阻拦力，保障着舰的安全性。为破解难题，罗阳带领团队扎根沈阳风洞实验室，开展了长达数年、多达600余次的风洞试验。经过不懈努力，歼-15的气动布局设计取得重大突破，滑跃起飞距离大幅缩短，有效载荷显著增加，在中低空机动性和高速飞行稳定性方面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在歼-15研发中，机翼折叠技术也是影响航母战斗力的核心要素。因其结构复杂，需保证多系统在折叠中稳定运行，技术难度极高，堪称航空工业领域的“珠穆朗玛峰”。面对这一巨大挑战，罗阳组建专项团队攻坚。据团队成员回忆，罗阳始终双本不离手，一本记录项目进度，精确到每个零部件的加工与交付时间；另一本则写满流体力学公式推导、材料测试数据和结构优化设想。经反复试验，团队成功攻克“卡脖子”难题，中国人终于为自己的舰载机插上了收放自如的“翅膀”。

飞控系统作为舰载机的“神经中枢”，直接掌控着飞机的飞行姿态与操控性能，其可靠性关乎飞行安全与作战效能，不容有丝毫因

失。但当时国外对相关技术严密封锁，国内研发基础近乎空白，研发难度极大。为突破这一困境，罗阳果断决策，抽调年轻工程师组成攻关小组，并积极联合高校、科研院所开展协同研发。经团队连续3个月驻守实验室，日夜奋战，对软件算法和硬件接口进行逐一排查、反复优化，我国成功实现了飞控系统的自主创新突围，响应速度超越国外同类产品，有力保障了舰载机飞行操控的精准性与稳定性。

先进的弹射起飞技术能够大幅提升舰载机的起飞重量与出动效率，使航母战斗群具备更强的作战能力。在舰载机与弹射系统的协同技术研发中，罗阳带领团队突破的舰载机结构强度、阻拦着舰等核心技术，为后续弹射试验奠定了关键基础。其建立的协同机制加速了弹射技术从实验室到工程应用的转化，使我国成功跻身世界上少数几个掌握舰载机阻拦着舰和弹射起飞核心技术的国家行列，显著提升了我国海军的远洋作战实力。

精神传承，照亮航空强国之路。我国舰载机研发领域人才稀缺，缺乏既懂设计又懂制造，且熟悉舰载机特殊需求的复合型人才。在罗阳担任沈飞“掌舵人”的5年中，他始终将人才视为企业发展的核心驱动力，构建起系统化的培养体系，通过“导师制+项目实战”模式，培养出一批涵盖气动设计、结构强度、航电系统等关键领域的专业人才，为我国舰载战斗机事业储备了雄厚的技术力量。此外，在团队协作方面，罗阳建立“矩阵式管理”体系，推行“发现即讨论、讨论即决策、决策即执行”的高效工作模式，使沈飞保持着较高的研发速度，战机年交付量也从4架攀升至近百架，成功驶入高质量发展的快车道。

罗阳牺牲后，航空工业集团成立了“罗阳青年突击队”，号召广大青年科技工作者传承罗阳精神。在后续的舰载机研发和航空装备建设中，“罗阳青年突击队”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歼-35研发中，队员直面隐身与航电技术挑战，深耕空气动力学与电磁学交叉领域，突破了隐身气动布局、先进航电系统等关键技术；在国产大飞机C919的研制过程中，借鉴罗阳管理经验，组建专项小组协同攻坚，实现了多项技术创新，不断推动航空科技在自立自强的征程中勇攀高峰。

